

二、第一次“知道了恋爱的苦乐”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处境相当艰难。日本政府先是千方百计拒绝他入境居留，后来虽然勉强同意孙中山居留，但却派巡查跟踪，日夜监视。孙中山住处不准“出户庭一步”，“户门紧闭，中国人往谒者，概行谢绝”。日本的特务、警察四处跟踪、盯梢。孙中山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严密控制下，不仅革命活动无法开展，而且连简单的生活也难以维持。孙中山在致函邓泽如及南洋国民党人中谈到当时在日窘境：“不特目前无进行之款，即同志中衣食亦多不能顾者”。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宋庆龄来到孙中山身边，给孙中山以巨大的支持和帮助。她积极为孙中山起草文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管理经费，以及从事革命党人的联络工作，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艰苦的生活磨炼人的意志，朝夕相伴、思想交流滋生了感情，两人默默相爱了。他们是那样心心相印，情投意合。孙中山也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宋庆龄了。

当宋庆龄回国后，孙中山完全变了样，经常陷入沉思状态。他原是个爱读书的人，现在则经常打开着书本，眼睛却凝视别处，心猿意马，甚至不思饮食。

房东梅屋夫人很担心，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饭菜不喜欢吃？他只是回答：“您别在意！”房东觉得这样下去怎么行？索性直率地问孙中山：“您不是患了相思病了吧！”他沉默一会儿回答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忘不了庆龄，遇到她以后，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爱，知道了恋爱的苦乐。”

他向她透露了心中的矛盾和苦闷。他说到因为自己为革命奔走、长期亡命在外而与之分居的卢夫人时，觉得她为了养育孩子，付出了辛劳，自己不应该有那种心情。但是，他又无法扑灭胸中燃烧着的对宋庆龄的爱情。梅屋夫人为孙中山那种青年人般的热情所惊奇。

孙中山最后终于下决心与妻子卢慕贞分离，与宋庆龄结婚。梅屋夫人提醒他，与年龄相差如同父女的宋庆龄结婚，会折寿的。他却说：“不，如果能与她结婚，即使第二天死去也不后悔。”梅屋夫人被孙中山的真诚所感动，于是决定帮助他操办婚事。

1915年3月，孙中山把原配夫人卢慕贞从澳门接到东京，协商办理分离手续。



在与宋庆龄一起工作并了解宋庆龄对他的爱慕心情以后，饱受了多年孤独之苦的孙中山，又燃烧起对爱情和家庭生活的渴望。由于这种新的渴望不仅无损于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反而有助于他的工作，所以他对宋庆龄的感情很快就远远超过曾为他养育了三个孩子的卢夫人。于是，他不得不与卢夫人办理分离手续。当时孙中山是采取分居协议办法处理这件事的，名曰分居，实为离婚。此后，卢慕贞独居澳门，孙科等子女仍奉养一切。应该说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为顾全卢慕贞的社会地位而采取的一种较为妥善的办法。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习俗，丈夫主动与妻子分离名曰“休妻”，妻子便被一般人视为“弃妇”而丧失社会地位。孙中山在致康德黎函中，用“divorce”（脱离、分离）一词，也说明他与宋庆龄结婚前便已与前妻离婚。孙中山处理这一问题的态度是严肃、负责的。

三、有情人终成眷属

孙中山与卢慕贞离婚后，就积极着手准备与宋庆龄的婚事。一方面由梅屋夫人陪同到商店采购家具；另一方面特请香山县同乡朱卓文和他的女儿慕菲雅（Muphia，宋庆龄童年时的好友）去上海迎接宋庆龄。

10月中旬，宋庆龄会见了朱卓文父女，阅读了他们带来的孙中山的急信。信中请宋庆龄与朱氏父女立返东京，面谈要事。朱卓文还向她口述了孙中山与卢慕贞协议分离的经过，出示了二人签署的离婚协议书，还说他是离婚的证明人之一。

宋庆龄为此深受感动，如她后来所回忆：起先我“不知道他已经办了离婚手续，并且想同我结婚。他解释他担心不这么做，我就被称作他的妾，这个丑闻就会损害革命，我同意了。我从未反悔”。^①

就这样，宋庆龄不顾家庭的反对和朋友们的劝阻，也毫不考虑与家庭决裂的后果，欣然接受孙中山的函邀，毅然离家出走，偕同朱卓文父女一同潜赴日本，回到孙中山身边。用她自己的话来说，那天晚上，“我从窗户里爬了出来，在女佣的帮助下逃了出来”。^②

10月24日下午1时10分，孙中山怀着激动的心情亲自开着汽车到东京车站迎接宋庆龄。

^{①②} [美] 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页。



▲ 1915 年 10 月 25 日，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图为孙中山与宋庆龄婚姻《誓约书》。

第二天上午，宋庆龄与孙中山十分愉快地到牛込区袋町五番地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中办理手续，在知友廖仲恺和山田纯三郎等数人前举行结婚仪式。^① 他们委托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厅办理了结婚登记，并由这位律师主持签订了婚姻《誓约书》。该书原文是日文，译文如下：

誓约书

此次孙文与宋庆琳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

-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 三、万一发生违反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

① 宋庆龄 1981 年 1 月审阅尚明轩著《孙中山传》二稿所书内容。



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 孙 文（章）

同 上 宋庆琳

见证人 和田瑞（章）

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①

1962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从私人手中征集到这份《誓约书》的原件，请宋庆龄亲自鉴定。她当时通过秘书作了口头答复，加以肯定。1980年3月18日，宋庆龄又亲笔签署：“此系真品。”并作了几点说明：

第一，誓约书上日期为10月26日，是按照日本当时风俗以双日吉利而写的。结婚日期实为10月25日。

第二，由日本名律师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府办理登记手续后所签法律上的誓约书。

第三，在誓约书上用“琳”字，是因为“琳”字较“龄”字书写容易。

第四，当时宋庆龄没有刻图章，所以誓约书上未盖章。

第五，抗日战争时，存在于上海孙中山故居的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姻誓约书两份，已为日本军阀掠去，可能这份就是其中之一。

孙中山与宋庆龄签订婚姻《誓约书》、办完法律手续后，当天下午，就到大久保百人町350番地（即今新宿区百人町二丁目23号）的梅屋庄吉家举行茶点宴会，作为公开的结婚典礼。

结婚典礼在梅屋家的二楼大房间举行。在正面二间的壁龛前面，八折金凤屏风，辉煌耀眼。左右两边是中国造的红木高低架，架上的青瓷大花瓶里插着盛开的菊花。

午后，客人相继来到，总共有五六十人。其中有执掌日本政权的政界人士，有真诚地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也有当时表示同情孙中山、却企图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实现各自目的的人物。他们是：犬养毅、宫崎寅藏、萱野长知、头山满、内田良平、古岛一雄、小川平吉、杉山茂丸、寺尾亨、佐佐木安五郎等等。接着，孙中山和宋庆龄坐汽车到来。

^① 原件藏国家博物馆，影印件及译文载《文物天地》1981年第2期。

宋庆龄戴着大花边帽，穿着一件粉红和淡绿花图案的裙子，衬裙透出白色，手里拿着一束花，显得十分俏丽动人。孙中山和她手拉着手进门来到达中庭，由等待在那里的照相馆的摄影师从各个角度摄下他们的情影。

客人们走过来，向他们表示祝贺，然后大家围坐在新婚夫妇的两侧，接着就举行婚礼。由房东梅屋夫妇充当媒人，新郎、新娘喝了梅屋夫人斟的交杯酒，犬养毅唱了《祝福歌》。这以后，头山满站在中间，孙中山和梅屋、宋庆龄和梅屋夫人，分别喝了结为义兄弟、义姐妹的交杯酒，酒宴开始了。

11月5日，头山满在上野精养轩主持有十多人参加的招待会，宣布了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的消息，招待会上展示了结婚仪式上客人围着新郎、新娘所摄的照片。孙中山一些真诚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朋友，为孙、宋的结合感到由衷的高兴。



▲ 1916年4月24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东京合影。

但这桩婚事，却遭到孙中山的亲朋和战友中大多数人的反对。他们议论纷纷，都认为很不妥当。早在他们结婚之前，孙中山的朋友们曾开会讨论，并派一个“代表”去说服他。但这个“代表”会见孙中山之后，竟一时说不出话来。孙中山问这个朋友，你有什么苦恼？这个朋友未发一言，就借故告辞了。中华革命党中的战友们，曾派遣代表、发出书信，对孙中山进行“说服”，胡汉民、朱执信还当面向孙中山“诤谏”，要求他取消这个打算。孙中山毫不客气地对他们说：“展堂、执信！我是同你们商量国家大事的，不是请你们来商量我家庭的私事。”^①

^① B. 马丁（Martin）：《孙逸仙传记》。转引自傅启学：《国父孙中山先生传》，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347—848页、第345页。



所以孙、宋结婚时，除廖仲恺、何香凝和陈其美外，中华革命党人都没有出席他们的婚礼。

对于各方面的阻挠和反对的舆论，孙中山毫不理睬，他坦率地对一些反对他同宋庆龄结婚的同志说：“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会恶习惯所支配”。他义无反顾地表示：“我爱我国，我爱我妻。”^① 这些肺腑之言，表示了一个革命者对待爱情、婚姻的光明磊落和坚贞负责的态度。

孙中山、宋庆龄在十分孤立的情况下，只有廖仲恺夫妇热诚地支持并衷心地祝愿他们幸福。廖仲恺、何香凝在孙、宋结婚时，曾领着儿女梦醒和承志，全家一起登门贺喜。说明孙、廖这两家人深厚的战友情谊，他们无论在革命或生活上都是相通的。廖氏姐弟是第一次见到宋庆龄，从此宋庆龄对待他俩一直亲如子侄。

非难还来自宗教方面。孙中山与宋庆龄都是基督徒，基督徒们认为他俩违背了基督教的婚姻观。“据说，他俩结婚以后，基督徒们都不太高兴。但没有同他俩断绝关系，也没有阻止他们参加基督徒的集会。过去基督徒们常常拿孙中山作宣传，鼓励人们信教；此后则很少提到他的名字了。”^②

其实，基督徒是无理指责孙中山的这桩婚事的，正如美国学者雷脱里克（H. Restarick）在《孙逸仙，中国的解放者》中指出的：“从人性说，他对于曾受高等教育、有完善性格、又了解他的女子发生爱情，是一件人人易知的事……就事实观察，他的再婚，同基督教美国千千万万男女的行为，在本质上并没有差异。”^③

当然，反对最强烈的自然是宋庆龄的父母了。宋嘉树发现女儿逃跑后，立即和妻子倪珪贞怒气冲冲地乘坐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客轮追赶到日本。可是，已经晚了，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礼已举行完毕。

后来宋庆龄向斯诺谈到她与孙中山结婚问题时说：“我父亲到了日本，狠狠地说了他（孙中山），企图解除婚姻，理由是我尚未成年，又未征得父母的同意。他失败了，于是就与孙博士绝交，并和我脱离了父女关系！”^④

孙中山在东京的住所房东梅屋庄吉的女儿千势子回忆那天的情景

① 《孙中山轶事集》，三民出版公司 1926 年版，第 167 页。

②③ 傅启学：《国父孙中山先生传》，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3 年版，第 348 页。

④ [美] 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04—105 页。

是：宋嘉树站在大门口，气势汹汹地叫喊：“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梅屋庄吉夫妇很担心，他们刚要走出去劝解宋嘉树，孙中山挡住他们说：“不，这是我的事情。”说着走向门口。梅屋庄吉还是不放心，就跟在孙中山的后面。孙中山慢悠悠地走到大门口的台阶上站着，稳稳地说：“请问，找我有何事？”突然，暴怒着的宋嘉树“刷”地跪在地上说：“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拜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然后在门口的三合土上磕了几个头，头都快蹭到地上了。就这样，他回去了。^①

几个月后，宋嘉树同他的老朋友传教士步惠廉谈到这件事时，用一句话发泄了他的极度痛苦：“比尔，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是我自己的女儿和我的最好的朋友给害的。”

然而，宋庆龄的父母毕竟是受过西方民主精神熏陶、有见识明事理的人。当他们看到孙、宋已经结婚而无可挽回时，就只好承认事实，与女儿、女婿和解了，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如埃米莉·哈恩所说：“宋氏一家尽管对此非常恼火，但他们并未张扬出去。姐妹之间曾经一度互不理睬，宋夫人也未停止横加指责，然而局外人士对此却一无所知。宋嘉树并没有因为女儿的行动而动摇了自己的信仰，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孙中山、为祖国的未来尽心尽力。”罗比·尤恩森也说：“宋耀如当了自己的老朋友和同辈人的岳父，感到难为情，但他还是孙中山的朋友，继续在政治上同他共事。”所以，宋嘉树说同孙中山和他的党“断绝一切关系”，以及同宋庆龄“脱离父女关系”，只是一时的气话而已。

事实上，宋嘉树夫妇回国后，还为女儿结婚补送了一套古朴的家具和百子图缎绣被面的嫁妆。这一份嫁妆，被宋庆龄视为最珍贵的纪念物，一直珍藏在身边，保存得十分完好。

宋庆龄违抗父母之命并且私奔到日本与孙中山结婚，起初对她父母的刺激和打击是很严重的。宋嘉树曾要求日本政府阻止他俩结婚，但没有成功。宋嘉树为此病情加重，回国后便病倒在青岛。这时他十分痛苦和孤独，宋子文、宋美龄在美国，宋蔼龄在山西生孩子，只得把女婿孔祥熙叫去作陪。宋庆龄十分热爱父亲，因为婚事而不得不违抗父亲，使她一直感到内疚和痛苦。晚年她对人提起此事还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

^① [日] 车田让治：《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第293页。



然而，国内的许多年轻人却对孙、宋婚事非常赞成。这个消息甚至传到了地处大西南的四川。当地拥护孙中山的学生“为自己的领袖娶了这样一位非凡的姑娘而热烈欢呼”。他们一致认为，宋庆龄能够帮助孙中山制定进步纲领，同时还能协助他进行改革。在饱受几千年封建礼教之苦的年轻人眼中，甚至还把孙、宋的结合看成是对旧礼教习俗的挑战和追求个性解放的象征。这种完全符合西方人观念的习俗，在四年后五四运动中成为一种时髦。许多有文化的男女青年都因不满家庭包办的婚姻而重结良缘。所以王安娜后来在她写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评论说：孙、宋结合，使年轻一代“深为感动”，“庆龄成了新的自由和理想的化身，成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

不管人们的毁誉褒贬，孙中山与宋庆龄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宋庆龄在婚后不久给美国同学安德逊（A. Anderson）的一封信中，曾充分表述了她同孙中山结婚的欢乐心情，信中说：“婚礼是尽可能的简单，因为我俩都不喜欢繁文缛节。我是幸福的。我想尽量帮助我的丈夫处理英文信件。我的法文已大有进步，现在能够阅读法文报纸，并直接加以翻译。对我来说，结婚就好像是进了学校一样。不过，没有烦人的考试罢了。”^①

婚后，宋庆龄继续担任孙中山的私人秘书，成了孙中山工作上的亲密伙伴。为了帮助丈夫做更多的工作，她不仅学习了法语，而且开始学习密码。不久，她负责处理孙中山所有的密码和译码工作。

同样，孙中山也对婚后的生活极为满意。三年以后，即1918年10月17日，他在给自己的老师英人詹姆斯·康德黎（James Cantlie）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的最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②

宋庆龄和孙中山的结合，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对宋、孙二人的革命生涯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的岁月证明，这桩婚事对孙中山最后十年的革命活动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而对于宋庆龄革命的一生来说，则始终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这一对夫妇，实在可以

① [美] 项美丽（Emily Hahn）：《宋氏姐妹》，香港1941年英文版，第97—98页。

② 《致康德黎函》（英文），载《国父全集》第5册，台北1974年版，第416页。

称为伟大的革命伴侣。

宋庆龄一直极为珍视她与孙中山结婚的日子，甚至在六十多年之后，回忆起这一天的时候，仍激动地说：“10月25日，在我的生活中，这一天是比我的生日更重要的日子。”^①

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是一对理想一致、心灵相通的佳偶的结合，双方都获得了真正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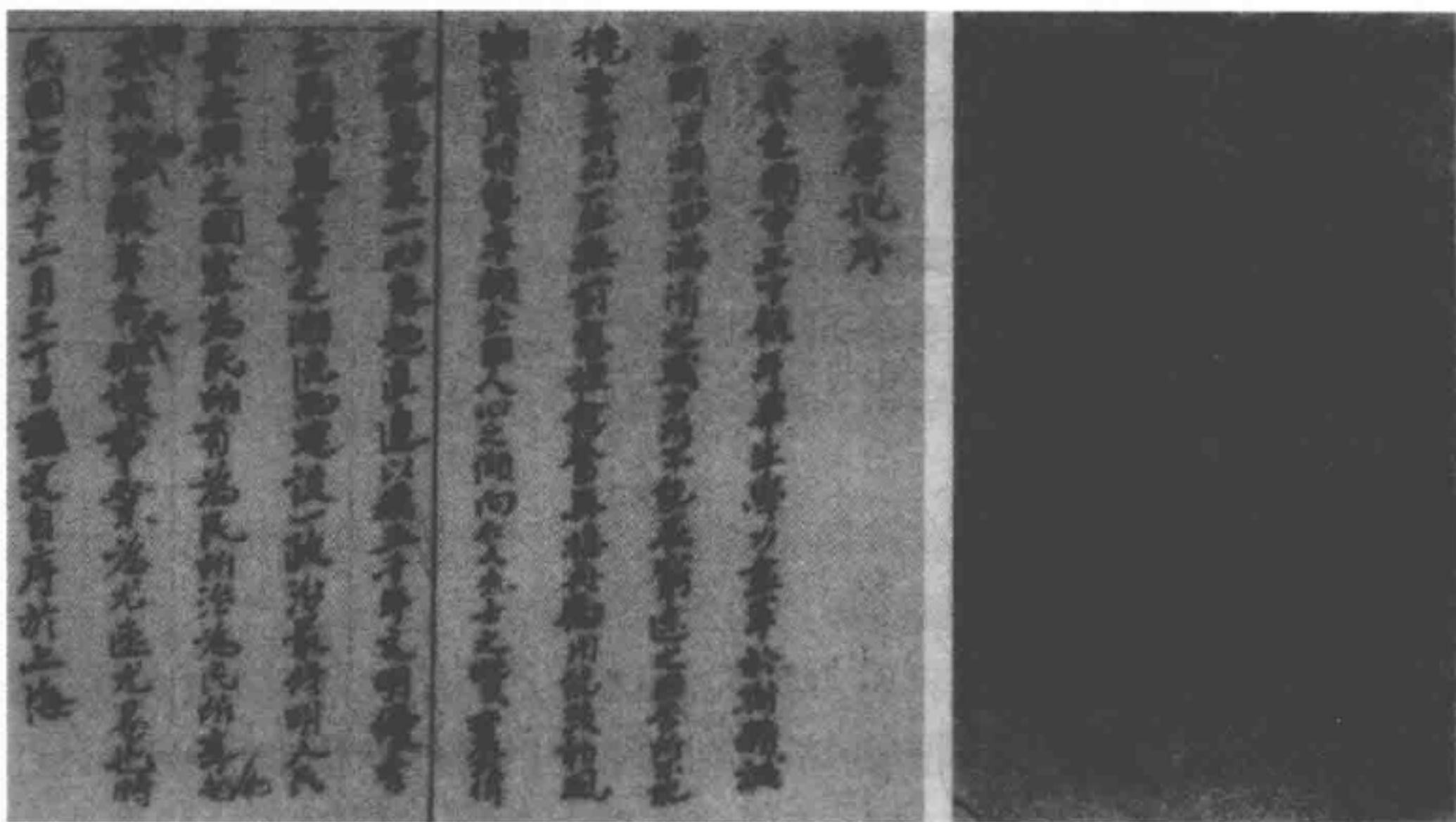
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一个人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经历了完整的爱情的所有自然阶段，则只有一届青春期，不可能或很难再次产生爱情。但爱情的发展受到扭曲，则可以产生第二届青春期。

对孙中山来说，他早年与卢夫人的结合，乃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根本谈不上爱情。他长期流亡国外，从来没有体验过真挚的爱情生活。突然，年轻、活泼、端庄的宋庆龄出现了，她把整个身心都奉献给孙中山，对他的事业寄予无限热情，尤其是深切地理解他的宏图大略、愿望和理想，并情愿与他同甘共苦。宋庆龄的到来，像一颗火星点燃了孙中山的生命之火。他“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爱，知道了恋爱的苦乐”。过去那种寂寞无奈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革命挫折、心灵创伤、生活艰难等等，都可能从宋庆龄的帮助和抚慰下得到补偿。正如一位外国人所指出的：“孙中山有了宋庆龄这样的革命事业上的杰出助手做终身伴侣，这使他有了新的活力和新的希望。这位新夫人，尽了她最大的努力，千方百计减轻丈夫的负担，实际上她一直担当着他的秘书的重任，她慢慢了解到他们结婚的幸福，从前的不满也烟消云散了。”^②孙中山也掩藏不住自己幸福的心情，坦率地说他从此“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真正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孙中山仿佛找回了逝去的青春岁月，与宋庆龄的结合成为推动他振奋的动力之一。他举起“反袁”和护法的旗帜。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他撰写了一部全面论述中国经济建设的专著——《实业计划》，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制订了一个宏伟的实现中国近代化的建设方案。他晚年毅然改组国民党，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北伐，促进了第一次国内革命高潮，为

① [日] 仁木富美子：日文版《宋庆龄选集》译后记。

② [美] 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上海三民图书公司1926年版，第58页。



▲ 孙中山题赠宋庆龄的《孙文学说》封面及扉页。

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光荣业绩。

对宋庆龄来说，她与一位伟大领袖结成伴侣，终于找到了人生的归宿。从此，她抛弃了优裕、舒适、安定的生活，过着艰难困苦而又动荡不安的日子，走上了献身革命的道路。她盼了好多年，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真的接近革命运动的中心”，并把革命目标同“亿万群众的幸福”联系在一起。她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袁世凯复辟帝制，她协助孙中山起草《第二次讨袁宣言》，进行口诛笔伐。十月革命胜利后，她遵循孙中山的指示，加紧学习俄文和德文，为联系苏俄及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打下基础。她与朱执信一起帮助孙中山起草了致列宁和苏维埃的电文，终于打通了这两位巨人的沟通渠道。五四运动爆发，她代孙中山起草了学生无罪的援救电报，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和工商界代表。陈炯明叛变，她“再三婉求”孙中山先行撤退，自己留下掩护，随时准备牺牲。国民党改组期间，有些右派分子以为宋庆龄年轻可欺，对她软硬兼施，妄想通过她来影响孙中山，当即遭到宋庆龄的“义正词严的拒绝”。凡此种种说明了，孙中山每一个重大革命行动，宋庆龄都追随其后，并始终成为他的坚决支持者和忠实执行者。

还有，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关于孙、宋二人间的关系，决非是一方面的，而是密切地双向关系，双向影响。孙中山是宋庆龄的导师、战友、同志和丈夫，给宋庆龄以最初的严格意义的政治启蒙，引导她进入民主革命的激流；宋庆龄则是孙中山的学生、助手、同志和妻子，对他

的思想和实践也予以积极的影响。孙中山之所以能够在“艰难顿挫”中“屡仆屡起”，在捍卫共和国的复杂艰巨政治斗争中，特别是在晚年改组国民党，向新三民主义转变的重大发展中，宋庆龄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宋庆龄以“孙夫人”的特殊身份，参与了孙中山最后十年的革命实践活动，与其并肩战斗，相互影响和促进；孙中山逝世后，她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事业和原则，使它与新的历史进程融会贯通，赋予孙中山思想以时代精神，使孙中山的旗帜长期蕴涵着生命力和凝聚力。在宋庆龄单独生活的56年期间，一直活跃在中国近现代政治舞台上，她是第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又是联系和团结中国各种不同政治力量的桥梁。在崎岖坎坷的革命道路上，她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紧随着历史潮流勇猛前进，成为新中国缔造者之一，并奋力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在争取世界和平以及妇女儿童事业上的成就，更是举世赞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四节 袁世凯的败亡

一、孙、黄分裂与复合

孙中山和黄兴从 1905 年结识后，成为了多年并肩奋斗的革命战友。他们之间真诚合作，极力维护革命党人的团结，领导人民推翻帝制，成为共和国的缔造者。孙中山与黄兴，虽然存在出身、经历、性格和气质上的差异，但他们互相尊重，合作共事，尤其是黄兴十分尊重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在长期斗争中他们结下深厚的友谊。正如 1915 年 3 月孙中山致黄兴函中所说：“20 年间，文与公奔走海外，流离播迁，同气之应，匪伊朝夕。”^① 从同盟会成立时起，经过多次武装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黄兴都是孙中山的最得力助手。显然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路线斗争和重大政治分歧。

1913 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黄之间由于产生重大分歧而分手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首先，是出于所谓“理想家”与“实际家”的消极舆论的影响。早在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内部如谭人凤、宋教仁等就有“孙氏理想，黄氏实行”而推崇黄兴的看法。辛亥革命的高潮中，这种舆论已经相当普遍地传播到同盟会内外，动摇着、危害着孙中山的威信。反动势力和资产阶级立宪派借此挑拨孙、黄关系，打击孙中山。陈其美在孙、黄分裂后，致黄兴的一封长信中指出：“夫谓足下为革命实行家，则海内无贤无愚莫不异口同声，于足下无所损。惟谓中山先生倾予理想，此语一入吾人脑际，遂使中山先生一切政见不易见诸施行。迨至今日，犹有

^① 《致黄兴书》，《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97 页。

持此言以反对中山先生者也。”^①应该承认，“孙氏理想，黄氏实行”，反映了一定的实际情况。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过去的斗争中，由于互相合作，取长补短，发挥了领导革命的重大作用。“不图革命初成”，这种“理想”与“实际”的舆论恶性发展起来，大多数革命党人赞成黄兴的“实际”，而排斥孙中山的“理想”，认为孙中山“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竟达到“众口铄金，一时风靡”的程度。孙中山后来说：“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施行矣。”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黄兴作为主要助手做了大量工作，所谓“诸事皆克强做主”是事实。孙中山一向主张的“革命方略”没有实行，在与袁世凯的斗争中被迫一再妥协，不断受挫，他更感到“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他痛恨许多革命党人不听他的主张，也就不免迁怒于大多数革命党人所拥护、赞赏的黄兴，这就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其次，是由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与实行“政党政治”的分歧。孙中山解职总统时，在政治上是较为悲观的，认为“革命主义，无由贯彻”，对袁世凯期以“小康”，主张退为在野党，从事社会改革，经营实业，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进行“政党政治”，组织“责任内阁”是比较消极的。而宋教仁一派则相信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坚持成立“责任内阁”，因此积极推行同盟会合并其他中间党派，建立国民党。孙中山虽然被推为国民党的理事长，但同盟会时的总理制改变了，他的民生主义被抛弃了，他的思想指导地位和领袖地位实际上被否定了。孙中山以“理想派”而在党内失势，日益孤立。对宋教仁等的这一切活动，孙中山是消极被动的，而黄兴则是支持的态度。这显然加大了孙、黄之间的潜在分歧。

第三，就是所谓“武力讨袁”与“法律解决”的公开分歧。宋教仁被刺的真相大白，孙中山从日本回国立即主张兴兵讨袁。黄兴手中已无军事实力，“动摇于战与和之间”。他周围的国民党将领“皆主慎重，以避袁氏凶风”，对黄兴影响甚大。黄兴认为“南方武力不足恃”，主张“法律解决”。孙中山明确指出：“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经过多次会议，反复争论，意见仍然不能统一起来。孙中山十分气愤党内这种严重右倾和缺乏起兵讨袁的勇

^① 陈其美：《致黄兴书》，《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商务印书馆1944年增订版，第266页。